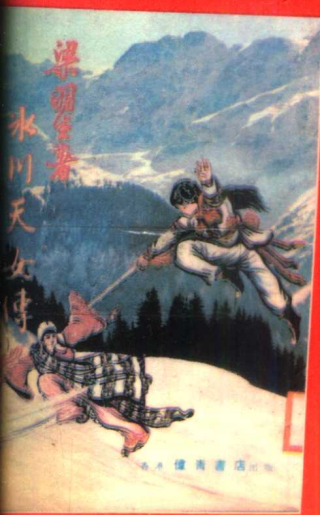


豪华珍藏本



现代 中国

武侠小说

辞典 鉴赏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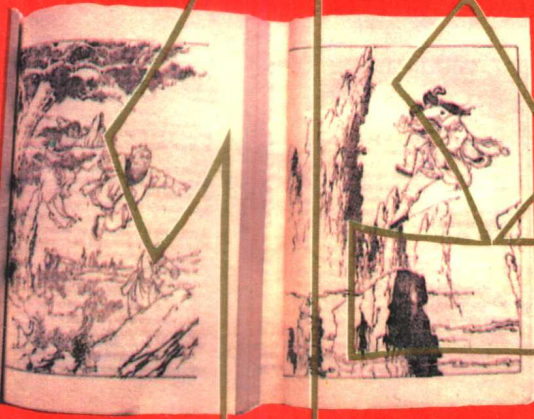


刘新风 陈墨等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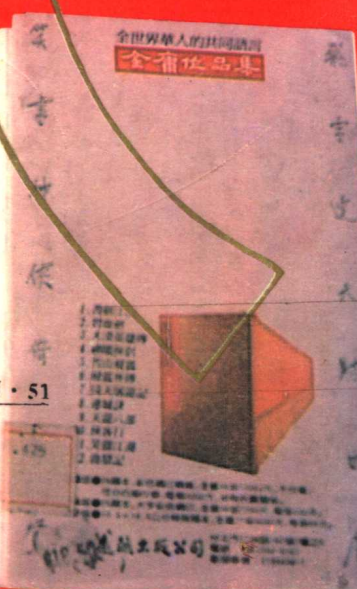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
装帧设计
责任题

彦人初
柯秦赵
秦朴初



卧龙生、诸葛青云、东方玉、上官鼎……作品不胫而走，真名实姓却如神龙见尾不见首，何许人也？本书对几十位作家的简介，首次披露了蜚声海内外的现代武侠小说名家简历。您从中可以惊奇地看到：享有盛誉的诗人、硕果累累的化学科学家，甚至有甫卸戎装的将军……



ISBN7-81001-2910-3/J·51
定价：31.00元

B99880

B396853

北京
藏書

北京
藏書

北京
藏書

序

冯其庸

“侠”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侠”的历史已经很久了。韩非子在《五蠹》篇里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他把“侠”与“儒”对举，足见当时“侠”在社会上已有相当的影响。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里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他在《太史公自序》里还说：“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背言，义者有取焉。作《游侠列传》。”

司马迁在他用生命和鲜血写成的《史记》里居然为“游侠”立传，这一方面反映了司马迁卓越的历史观和社会道德观，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游侠”的社会作用和社会影响越来越大了。司马迁对“游侠”是赞扬的，他特别指出了“游侠”的品德：仁、义、诚、信，不爱其躯，存亡死生，救人于厄，振人不赡。用现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济困扶危，申张正义，舍己为人，抱打不平。由于司马迁的《游侠列传》，“侠”这种社会力量就进入了史传记载，也在韩非子之后进一步促进了“侠”文化。此后，“游侠”这个主题，就不断见之于歌咏。西晋张华有《游侠篇》，东晋陶渊明有《咏荆轲》，北周王褒也有《游侠篇》。之后，“游侠”便成为诗歌的一种常见的题材。

“侠”进入小说，大概要首推《燕丹子》。此书成书年代众说纷纭，近人以为是东汉末年之作。故事写荆轲刺秦皇。这个故事实际上在《史记》里已有相当生动的描写了，当然到了《燕丹子》里，更具有了小说的规模。

以侠义为题材的小说，到了唐代就有了更大的进展，可以说进入了初步繁荣的时期。据罗立群《中国武侠小说史》的统计，唐人传奇里写“侠”的就有四十篇之多。武侠小说，再经宋元明清各代的发展，自然也就洋洋大观了。其中长篇小说《水浒传》，应该说是此类作品的杰出代表，由于它在思想方面和文字方面的高度成

就，此书已成为公认的古典名著，也是“侠”文化的一个高峰。实际上《水浒传》已经大大突破了旧有的武侠小说的范围，就其社会内容来说，已经是大规模的农民集体起义，目的是夺取和建立政权。就其反抗的方式来说已从初期的个人反抗、少数人反抗发展到千军万马的战阵反抗、攻城夺地的反抗了。所以，《水浒传》一方面确是侠义小说，是侠义小说的巨大发展；另一方面，它已大大突破了武侠小说的范围，具有更深的历史内涵和社会内涵了。

武侠小说依其内容，当然还有种种的区分。但是不论它有多少的差别，其中有一点是共有的，这就是思想内容上的正义感。可以说正义感是一切侠义小说的灵魂。如果没有了正义感，那么不论它写了多么高超的武艺，它也决不能称为武侠小说。因为凡是武侠小说，矛盾的双方，必定有一方是代表正义的，而且经常还占主要的地位。“侠”与“盗”及其他的区分，也就是在正义与非正义上。所谓正义，那就是保卫人民，保卫弱者（即被压迫者），反抗强暴，反抗压迫，舍己为人，颂扬爱国精神、民族精神等等。

由于以上的内涵，所以武侠小说是具有积极的社会作用的。我感到长期以来，我们的文艺理论界对这一点认识不足，因而对武侠小说重视不够。当然，所有的武侠小说，都必定要写到“武”，写到个人反抗或少数人的反抗；而且所有的武侠小说，必定要写到与正义一方处在对立面的非正义的一方，而这一方的行为必然是凶残的，非道德的。因之，如果不能正确的阅读武侠小说，对武侠小说不加强理论上的指导和评论的话，也可能会有某种副作用。但是，世间任何事物，都不可能都是单一的作用。即使是人参，吃多了也能致病。文艺作品则更不可能只起一种单一的作用，世界上决不可能找到一部只能起一种单一作用的作品，因为作品对人的思想起作用，主导的方面还是在人，而不是在书。人的思想端正、正确，那么，对作品就能具有分析和批判的能力，人的思想不好，那么往往他就会到优秀作品里去找消极的东西。所以对武侠小说里所具有的为作品所否定的一面，也应该作如是观。当然，就是作品肯定的一面，也需要用历史的眼光、分析的眼光来看，即使是正面人物，其行为和处事的方式等等，也决不是今人的模仿对象。武侠小说，带有相当浓厚的幻想色彩，所以有人又称它为成人童话，这是有一定道理的。所以对于武侠小说，关键是加强理论的指导。

封建社会里的武侠小说之所以繁荣，很显然是因为它具有对封建统治的反抗的一面（当然后来也出现了维护封建统治、维护清官的作品，实质上这类作品，已是武侠小说的衍化了）。人们在封建政权的压迫下，除了用暴力的集体反抗，农民起义外，就只能寄希望于这种个人的侠义行为的反抗了，尽管这种反抗不能解决根本的社会矛盾，不能改变阶级压迫的现实，但人们还是同意借此类小说以抒发自己的愤

郁，作为不平遭遇的精神补偿和弱者的精神慰藉，所以武侠小说能够长期的延续和不断的发展。

武侠小说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它既是一种文化传统，又是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一种大众化的文学形式，它是小说中最为大众化的一种品种，因此对武侠小说只能采取指导和引导的办法，而不能采取绝对禁止的办法，因为禁是禁不止的。

自民国以来，武侠小说得到了特殊的发展，平江不肖生向恺然的《江湖奇侠传》，赵焕亭的《奇侠精忠传》，顾明道的《荒江女侠》，还珠楼主李寿民的《蜀山剑侠传》，官白羽的《十二金钱镖》等等，都是轰动一时之作，特别是五十年代以来，港台及海外新派武侠小说勃兴，梁羽生、金庸、古龙、萧逸等的作品风靡一时，尤其是梁羽生、金庸，影响更大。在台湾已经出版了一套《金学研究丛书》，研究金庸的武侠小说而成为“金学”，这并不是偶然的。金庸的小说，我全部读过，其中有一些如《书剑恩仇录》、《天龙八部》、《鹿鼎记》、《笑傲江湖》、《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等等，我读过两遍到三遍，而且现在还在读。我认为金庸的武侠小说，是小说史上的一个奇迹，是对武侠小说的大大的飞跃，无论是他的小说的思想主流和文学描写，都是超一流的，不仅如此，他的小说蕴藏着深厚的爱国精神和民族精神，蕴藏着渊深的哲学思想和博大精深的佛学思想。总之，他的小说内涵，历史的、哲学的、文学的、民族的、传统的、民俗的以及历史地理等各方面，在在都有，称得上是博大精深，所以，无怪乎他的书要举世皆读，洛阳纸贵了。

关于武侠小说的研究，近来也有发展，去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罗立群著的《中国武侠小说史》，是一部下了很大功夫的著作，对于阅读和研究武侠小说，了解武侠小说的发展史，是极为有用的。

现在，刘新风、陈墨等同志又撰写了《中国现代武侠小说鉴赏辞典》，收1919年以来的武侠小说共408个条目。我在本文前面已说过，对于武侠小说，应该加强阅读和指导，目前的现实情况是武侠小说已大量出版，但却很少指导性的读物，这种情况应该尽快改变。这部《鉴赏辞典》的问世，是非常及时的，是对广大读者阅读武侠小说所提供的一部指导性的著作。从此可以稍稍改变以前那种盲目阅读的状况了，所以我认为刘新风、陈墨等参加撰写本辞典的同志，是对社会、对文化事业作出了一件非常及时的有益的事。罗立群的《中国武侠小说史》是从纵的方面来讲的，读者可以了解中国武侠小说发展的一个脉络；而这部辞典，则是从横方面来讲的，可以让读者得知每部作品内容梗概和如何去欣赏。这后一部分，对于具体阅读武侠小说，尤其具有指导作用，其重要性就自然可想而知了。

我并没有专门研究武侠小说，只是爱读，八十年代以后，我一直在反复读金庸的作品，我当然还希望能读其它各家的作品，那么这部辞典对于我自然也是极为有

前 言

——五四以来武侠小说发展概述及 我们的感言。

何谓武侠小说？

有人把武侠小说的源头，上溯到太史公的游侠、刺客“列传”，有人把武侠小说的成型定于唐传奇的《虬髯客传》、《红线》、《聂隐娘》，也有人把鲁迅先生所言的侠义公案小说《三侠五义》、《施公案》等就看做是武侠小说的代表。

然而，求古，未必就等于求科学。鲁迅先生的话也当不得金科玉律——况乎对鲁迅原话的征引时，其含义又有很多是后人肚子里嘀咕出的新诠释、甚至歪批，很难说其领会了鲁迅先生的真正意思。

鲁迅先生所说的侠义小说“大旨在揄扬勇侠，赞美粗豪，然又必不背于忠义”，“虽意在叙勇侠之士，游行村市，安良除暴，为国立功，而必以一名臣大吏为中枢，以总领一切豪俊……”^①可见，鲁迅所认定的侠义小说，其一是叙写勇侠，其二则也看到了其必以一名臣大吏为中枢的特点。对这之中的侠士如何看，后来的鲁迅也曾有过概括：“他们出身清白，连先前也并无坏处，虽在钦差之下，究居平民之上，对一方面固然必须听命，对别方面还是大可称雄，安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着加

^① 《中国小说史略》

足。”^①这是典型的奴才和鹰犬。鲁迅先生是从社会历史学、文化学的角度，剖析了他之所谓“侠义小说”中的所谓侠，所谓义，从而透露出他那侠义小说的规定性内涵。然而，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书成于本世纪二十年代之初，初版于1923、1924年；它所论述到的侠义公案小说，不惟权举一二，而且下限也仅止于清末，因此，作者无由对当时尚自方兴未艾、风起云涌的武侠小说创作臧否一二。所以，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固步自封于1924年的《中国小说史略》，以鲁迅先生对前此小说现象的总结而否定此后、乃至鲁迅先生本人逝世以后的某些文学发展——我们只陶醉于那种鲁迅式科学并且犀利的文学史观；我们也同样不能在三十年代具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前提的左翼文化界对武侠小说的、甚至有些偏颇和绝对的攻讦里划地为牢。我们的责任只有一个，那就是：发现历史，力争科学公允地评价历史；用我们自己的头脑想，用我们自己的嘴说。我们应该抛弃一切成见，绝不借口任何理由而放弃自己的原则，却去迎合某种压力和看起来咄咄逼人的气势。

我们说，武侠小说的出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正如类人猿之进化成人，我们无法确切地考察出其发生“质变”的那一天一样，对武侠小说的产生，我们也只能“模糊”一把。

但有一点值得指出，写侠、写武的东西，也还未必就是武侠小说，虽然武侠小说的成立必须以写武写侠为首要前提。还以类人猿为例。尽管类人猿可能具备了某些人的素质、甚至是几乎具备了人的思维，但是我们还只能把它们叫“猿”而不能叫“人”。司马迁的“游侠”、“刺客”无疑属于传记文学，距离“小说”相去甚远自不必说，即便是《虬髯客传》那样的作品，具备了某些“小说”的雏形，《七侠五义》那样的小说叙述了某些侠义的举动和技击的情景，我们也还不能因为它们写到了“武侠”就把它们草率地称做武侠小说。我们觉得那样作不但失之牵强，而且很不明智，或者很不“科学”。因为如果按照那样的推理，《桃花扇》写到名妓李香君，《日出》写到窑姐儿花翠喜，二者便理应划进娼妓文学范畴，《水浒传》写到梁山好汉打富济贫、进剿祝家庄、曾头市便理应划进强盗文学圈子，从而重新跌进“海淫海盗”式的可笑的可笑的毁谤。《儒林外史》呢，因为也写到了大侠甘凤池、写到了甘氏在马二先生家踢马，自然也应该是武侠小说了。且不说，歌德曾经借助于魔鬼靡菲斯特的阴魂而来从事人生哲理的探索，托尔斯泰曾经选择了安娜·卡列尼娜而来强调他个性解放思想追寻呢！如果说前者的“鬼怪”不入流，那么安娜在有些中国人的眼里，就是典型的“破鞋”，尤其应在鄙夷、排斥乃至唾弃之列了。更何况张生与

^① 《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崔莺莺的西厢媾合也有“通奸”嫌疑，贾宝玉意淫秦可卿、“初试”花袭人又都相类于“流氓”行径呢！

《七侠五义》之类的侠义公案小说，最易被人误认为是武侠小说，这不但是因为有些人便于乘机借鲁迅而恐吓人要挟人、故而有意引人盲从的缘故，而且还因为其中的确有相当、甚至很大的篇幅写到了武侠，写得绘声绘色、有情有景。南侠展昭鹏雄飞可以象后来的金镖黄天霸那样被我们视做封建朝廷的鹰犬而不值一提，但是北侠欧阳春，却以其较为完美的人格、超绝的武功、以及那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风采，着实夺人心魄、令人神往。不消说，虽然欧阳春的形象与我们心目中的武侠、乃至与新派武侠小说中的那些剑客相比，也还存在着某些差距，不能说十全十美，但是，他却的确是一位名符其实的武侠。武侠小说形象的塑造与武侠事迹的叙写在类似的小说中赫然地占有着一个相当重要的地位和比例，这一点已经毋庸置疑，然而，如果就此便断定《七侠五义》们就是武侠小说，那还未免显得过早、过于简单。仅以《七侠五义》为例。这部由话本演化而来的章回体长篇小说，一开始并不是为了给侠士们树碑立传，也并不是为了从侠士的活动中透视生活，更不是为了提倡侠士精神、鼓吹尚侠意识，或者干脆把社会生活愿望完全寄托在侠士的肩上，并且从中获得人生的慰藉与寄托，它只是从狸猫换太子的宫闱秘闻说起，敷衍出一系列扑朔迷离的公案故事，最后推出了一个惊天地、动鬼神，上肃朝纲，下整黎野的朝廷柱石黑包公包拯包龙图，为世人带来一线希望，也为命官树立一个样板。清官，是小说撰述乃至歌颂的首要目的与核心内容；公案的设置与侦破是小说张扬清官行为的角度、环节与必要手段；而此外的侠客们的涉足与染指，则至多是除为清官断案稍尽绵薄之外，而为说书人吸引听众提供一些饶有兴味的调料，以便使自己的那“正传”能够得以顺利地进行下去。这类小说中关于武侠的描写——哪怕这“描写”甚至冲击了作者的初衷、主旨与故事的主线，就小说的创作与文学现实来说，那也只不过是一个喧宾夺主式的意外果实和种瓜得豆式的奇怪收获。何况统观这类小说，能够以武侠冲击、进而代替主线的作品实在是少之又少呢！所以，《七侠五义》虽或名曰“侠”曰“义”，但也终于有人更直接、更确切地呼之为《龙图公案》了——这是其最初的雏形时的称呼——难怪钱静方氏也曾认为“《七侠五义》一书，亦以包公为主。”①

文康所著的《儿女英雄传》亦复如此。这部泛五十三回（现存四十一回）的长篇小说，叙述了一个“金玉缘”的故事，塑造了一个“儿女英雄”形象。侠女何玉

① 钱静方《小说丛考》

凤为报父仇，改名十三妹，出没市井，偶救贵家公子安骥与落难少女张金凤，并撮合二人成婚。后何氏仇人（影射年羹尧）被诛，她也允嫁安公子，与张氏情同姐妹、合睦共处，帮助丈夫读书上进，遂使安氏科场连捷，位极人臣。按作者意思，本书前二十回是“为何玉凤作传”^①，但统观全书，我们觉得，何氏形象大放异彩、令人回眸不已之处亦不过第四至第十回这一段，而其余的绝大部分，却是为作者那“儿女无非天性，英雄不外人情”的观点服务，纠缠于名教纲常、荣华富贵不忍释手。因此，有人这样认为“其书虽传何玉凤，实则传年羹尧也。”^②而鲁迅先生也这样断言：十三妹“当纯出作者臆造，缘欲使英雄儿女之概，备于一身，遂致性格失常，言动绝异，矫揉之态，触目皆是矣。”^③至于《中国武侠小说史略》的作者，尚自余兴未尽地冥想着小说作者倘能如何如何，那都是因为他实在不明白文康前辈“今者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也”。作者本人尚且耿耿于此，那么，我们如何能够指责他不继续沿着光彩夺目的武侠小说路数写下去，而来自己糟塌这位侠女形象，用更多的笔墨倒读者的胃口呢？

我们只能接受一些并不尽如人意的现实。

既然武侠在此类小说的创作目的、出发点乃至整体的故事结构与情节展开中并未上升到主体地位，并未对整部小说的存在与成就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因而不可或缺，那么，我们不知道“《七侠五义》为武侠小说论”者们，还有什么更加雄辩的论据能够证实并且支起自己的观点。

那么，确认一篇作品为武侠小说，需要依据什么标准，或者说，名符其实的武侠小说应该具备哪些特点呢？如果用一句话简略概括的话，即：看那部小说是不是“以武侠始，以武侠终”。所谓“以武侠始”，即这部小说的创作，首先是要以武侠形象、武侠故事反映武侠生活的——这形象、这故事、这生活，均未必是现实中固有的，正如阿Q、阿Q与小D比捉虱子、以及阿Q所生活的未庄、土谷祠、阿Q所作的杂工与偷萝卜一样，都不必是某时、某地所生活的真人，所发生的真事。所谓“以武侠终”，即这部小说最终对生活的理解是借助于武侠实现的，或者说由于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代，大多数人的生活理想与愿望无法得到正常的实现与允可，因此他们有的人便把希望寄托于神话传说，寄托于宗教信仰，到了现代社会，有的人则寄希望于科学幻想，但更有人却始终把希望寄托于武侠。较之神话，武侠显得更切近；较之科幻，武侠显得更真实；较之宗教，武侠则显得更乐观。因为武侠绝不

① 转引自《中国古代通俗小说阅读提示·你怎样照那柄“风月宝鉴”？》

② 蒋瑞藻《花朝生文稿》

③ 《中国小说史略》

会象神话那样高不可及，也不会象科幻那样虚无缥缈，更不会象宗教那样，只给人以精神上的慰安，而从不给人以肉体上的尝足。正因如此，所以，武侠的创造者们——包括想象中的、笔下的与通过文字而丰富、而活动了的意念中的创造——便通常把生活幻想成为一种武侠的生活，把社会幻想成为一种武侠的社会，因此，在这些人的笔下与思想意识里，对应着那个冷酷而真切的现实世界与历史，他们又创造了一个纵横捭阖、酣畅淋漓的武侠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正义就是正义，邪恶就是邪恶；善绝不会象我们所置身的这个天地那样，常常被湮没在无边无际的庸碌、忙乱与繁杂里丧失自己的光彩，恶也一定不同于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往往混淆、错讹与伪装，而得到漫画式的、历史图卷式的与诗一般的夸张与具象——当然，这种夸张与具象，并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下的简单化、概念化，相反，它却具有更加斑斓的迷彩、更加盘根错节的意趣与更加苍茫莫辨的境界，只是在把漫长的时间挤压在瞬间的巨大的反差里和把广阔的空间戏剧性地并举的惊人的对比中，才可能让我们那么准确迅速地认识到恶的精髓与实质。正因为人们拥有了这样一个世界，所以，他们才从中品尝到了把握历史的无限的乐趣，他们才可能在属于自己的这个世界中，无拘无束地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设计这世界，来安排这生活，来驱使这芸芸众生——包括其中的伟人与奸雄。由此，他们如期地一次次完成自己的人生追求，一次次地实现自己的生活愿望。而这一切，都是基于他们对于武侠的如痴如醉的狂想和理念认同，基于他们所赖以狂想与认同的武侠世界。这世界，就是那些小说最终为读者提供的伊甸园。这样，这些小说终于把人们的希冀之星，幻化在义侠的刀光剑影之中了。

这就是武侠小说。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界定武侠小说，当有如下三个条件。

其一，也是最基本的一点，即该作品必须以写“武侠”为主。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武侠”不就是打斗，不就是技击。“武”，包含着以力相格，比试功夫的内容；“侠”，也常以勇力为其实现的前提。但是，我们看到，确有许多武侠小说，在铺写不厌其烦的拳脚之外，切入了更加古奥深邃的武学思想与行侠意识，至使小说全然摆脱了束手手足之能、拘于筋骨之力的纯粹角抵动粗、好勇斗狠的俗套，升华到了一个更加宽泛、更加玄妙，同时也更加细腻凝重的哲学程式之中，借助对武学的思考和对侠风的演绎，透视生活与人性的本质去了。所以有的武侠小说，并不精心于武技的一招一式的介绍。陆小凤的双指与西门吹雪的剑、李寻欢的飞刀，如何出手，快在哪里，你永远也看不到、猜不着，但是，它们却是那样具有迷人的魅力，不由你不“信”，不由你不拍案称绝。金庸先生的封刀之作《鹿鼎记》，写了一个连自己父亲是谁都无法考证的混世活宝韦小宝。此人舌簧巧利，机变百出，生性嗜赌，尤

以撒谎使诈见长，数起来，欺师灭祖，无所不为，实无半点“侠”的影子；“武”呢？虽为“平生不识陈近南，就称英雄也枉然”的陈大侠客入室弟子，又与九难老尼有师徒名份，但他平生除开苟得神龙教主洪安通所教的“英雄三招”与洪夫人苏荃所授的“美人三招”之皮毛外，恐怕就会自务的撒石灰、下蒙汗药与得自九难的“逃跑”之术“神行百变”了，实在也够不上武林高手，赫然只是一个“三脚猫”。但是，对这小说，我们还就得承认它是一部武侠小说。否则叫什么呢？同意是历史小说——这种最通行、也最可以考虑的说法吗？显然也是不行的，因为按照吴晗先生关于历史题材文学创作的观点，这小说史据不足，简直就是穿凿附会，齐东野语，实乃“小说家言，不足征信”。

香港有人把《鹿鼎记》看做是金庸武侠小说创作的顶峰，这是不无道理的。因为金庸在塑造出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乔峰之后，发觉真正的大侠在现实生活中其实无法生存，太理想化，所以他才回归现实，写出一个韦小宝式百无一能、但却伶牙俐齿的市井无赖形象，以其一次又一次的逢凶化吉，一步一步的高升得意，嘻笑怒骂于这个不属于侠的、只听信空说而不看重实做的现实世界。因此，韦小宝是金庸武侠发展到极限的产物，从另外一个角度揭示了人们对于侠的重新深刻思考。对如此严肃地探讨武侠命运、分析武侠与现实之间关系的小说，我们只能称其为武侠小说。

其二，该作品中，在现实世界之外，应该独立地存在一个武侠世界。武侠们的活动虽与现实世界或有关连，但是，他们的大部分言行举止，大部分奔来驰往、飘乎西东，无疑应该是在他们特有的那个世界完成。换句话说，就是，他们一切都当不得真，都必须超然物外，天马行空，但同时又都必须受现实的适当约束，也难免跟着历史去跑。乾隆可以出自海宁陈家、与陈家洛为手足兄弟，张无忌也可以武功盖世、就任明教教主，但是红花会无法从清朝手中夺回江山，张无忌也绝不能成为明朝的开国君主。只有恪守了这一点，往往不免云山雾罩的武侠小说，才平空增添了许多现实味道，显得既不失严肃规矩，同时也不失活泼灵动。尤其是在此外，武侠小说又拥有了那样一个独特的奇异的空间，所以作者才可以驰骋想象，汪洋恣肆于异样的对于理想世界的自由挥洒之中，读者也才可以暂时回避纷纭尘世，陶醉在万难一遇的对善的尽情讴歌和对恶的尽情鞭挞里，尝足在生活中必须忍受循序渐进、有板有眼而无法尝足和实现的、由衷的忘情的快慰。此即所谓“实者虚之、虚者实之。实者虚之故不采，虚者实之故不脱，不脱不采，生机灵趣泼泼然”^①吧。

^① 明·李贽《广谐史序》

其三，即该作品所给我们提供的救世良方，必须是侠。如果在我们读完一部所谓武侠小说而得到的启示中，“侠”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动因，那么，这小说便不是“武侠小说”，起码也不是一部成功的武侠小说。

正因为武侠小说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是对现实历史的折射，是理想化的而非实际的，因此，它对生活的理解，对人生的认识，它从那变形的社会中所得出的结论，必然也都是理想化的、离奇的、甚至荒诞不经的。它们在武侠小说世界里遨游，最终必然选择武侠作为制衡这一世界的手段，尽管这手段的设置往往受在现实历史的左右与拘泥。侠是由武侠世界里诞生的，因此，他必须重新回到孕育了他的那个世界中去发挥作用。把“侠”由他那个赖以生存的世界里拉出，甚而寄望他能改变我们所蟄伏的这个世界，无疑是错了；然而，从侠所构成的世界中，我们如果选择除侠而外的任何道路而期望由此进行追求理想的跋涉，其问题也是不言而喻的。

这是我们甄别一部作品是否武侠小说的基本依据。

二

人们把改造社会的祝愿由明镜高悬的清官身上而迁至于来无影去无踪的武侠，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这说明了人们的法的观念的崩溃与自我权力观念的淡漠。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变革。它说明存留于人们心灵深处的那种英雄崇拜式的侠意识^①，已经把武侠作为一种改善人们总体生存环境的基本药方、而不是简单的人格规范加以依赖了——虽然一旦真有一个武侠式的傻子冲过去要在奴才住的小破屋的墙上撬开一方小窗洞时，恐怕连奴才自己也不会容忍，甚至会躺在地上打滚，叫嚷着抓强盗而去向主子邀功请赏的。^②

正因为上述这种意识的变革，所以到了二十世纪初叶，尤其是进入二十年代，一种成熟的武侠小说才得以出现（其它原因，恕不赘谈）。其内容中，武侠已绝不从属于宫闱、黑幕、艳情、公案、社会问题、历史事件等其他题材而仅仅是一种噱头和点缀了，它已经是整个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独立存在的部分，它有自己的行规，自己的切口，自己的善恶标准，自己的公证方式与机构，以及自己的领袖和疆域了。它

^① 关于“侠意识”产生的原因及其含义，请见1990年第6期《文史知识》中拙著《论侠意识》。

^② 见鲁迅：《野草·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有一个响亮的无所不包、无处不在又无影无踪的名字——江湖。^①

一九二三年初，“江湖”的形象，首次被文人以文字的形式记录在纸上。它标志着现实生活之外的武侠世界的最后形成。在这时出版的上海的《红杂志》第22期上，曾经在日本写了《留东外史》并因此得名的湖南平江人氏向恺然（号不肖生），开始发表了他的长篇武侠小说《江湖奇侠传》。及至《红杂志》出满一百期，更名为《红玫瑰》后，该小说照登不辍，并且随连载随出版单行本，历时六年，至一九二八年方始最后完成。其间，向氏写至一百零六回毕，因回湘它适，又嫌头绪太繁，难使条分缕析，故在这一回的最后写道：“至于两派的仇怨，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消释。不过在下写到这里，已不高兴再延长下去了，暂且与看官们告别了。以中国之大，写不尽的奇人奇事，正不知有多少？等到一时兴起，或者再写几部出来给看官们消遣。”于是草草收场，遛之大吉。作者感慨于大千世界的无奇不有，实在叙不胜叙。面对这些，他只能厌倦。一部《江湖奇侠传》正是这样海阔天空，包罗万象的急就章。其中前朝笔记、私人野史，他往往信手拈来，为我所用，游刃有余，无奇不传。此集出后，一直畅销不衰；海上同文，亦纷纷争相效法。从此，武侠小说始渐风起，不久已蔚为大观。《江湖奇侠传》遂被公认为此番武侠小说兴起的开先河者。

《江湖奇侠传》一百零七回到一百六十回，后由《红玫瑰》杂志的编辑朴肖生赵荻狂代笔续貂，却走上了志怪传异、每况愈下之路。向恺然所著武侠小说此外又有《近代侠义英雄传》、《江湖大侠传》、《江湖怪异传》等，或言有所本，或事出以因，但影响总归无出《江湖奇侠传》之右者。

向氏稍后，苏州一位参预发起一九二二年八月成立的文人社团星社的言情小说作者顾明道，也开始由“哀情”转而创作武侠小说。他的代表作是再版多次的《荒江女侠》。较之《江湖奇侠传》，《荒江女侠》不单线索连贯、简单，更具成熟长篇小说的结构特点，同时，故事也不事论道谈玄、子虚乌有的胡掰乱侃，意识到并且尝试着用严肃的笔法写严肃的武侠小说了。他的努力，为几十年后武侠小说得以新的姿态哗然崛起，报道了最早的信息，因此，相比之下，历来对他不吝褒扬者居多。

顾氏向患腿疾、巡游不便，故只安于在苏州振声中学教书，足迹大抵止于沪杭一线。但却能向壁虚拟，驰笔于江南塞北，甚而至于有《海上英雄初集》二册面世。此外，顾氏武侠小说尚有《浊世神龙》、《红粉金戈》、《血雨凉葩》、《剑气茄声》、《海岛鏖兵记》、《黛痕剑影》等多种。

世家子弟文公直，因于狱中得阅《千古奇冤》一书，有感于于谦的遭际。后观

^① 江湖：原意是指四方各地和那些到处流浪的人所从事的卖艺等生活。因闯“江湖”的人多身怀绝技，属武林中人，故这里的“江湖”即专指“武侠世界”。

世态人情，流览海上卷书，以为“除因革命高潮之澎湃，社会、经济之作，如雨后春笋，蓬勃丛生外，其余杂志小说渐趋入颓废淫靡之途，论者每慨叹为每下愈况，丧失我雄毅之国民性”，所以，为“昌明忠侠，挽颓唐之文艺，救民族之危亡，且正当世对侠之谬解，更为民族英雄吐怨气”。^①他连续创作了《碧血丹心大侠传》、《碧血丹心于公传》、《碧血丹心平藩传》，并计划续写《碧血丹心卫国传》，以明代忠臣于谦为小说的核心人物，辅以山林豪侠的趋避，昌明忠侠之道。此间作者关于“侠”的理解，明显已经跳出奔走江湖、锄霸安良式的狭隘的武林圈子，而是把它做为一个人生的道德规范加以宏扬了。

与顾明道同是星社社员的短小精悍的姚民哀，早年曾参加光复会、中华革命党等组织。据他自称，少时便随父出没于太湖流域，往返于江浙乡壤，故常出入于聚赌、贩盐的客民秘窟之中，“对于个中之特殊术语及风俗，是时已习见熟闻。因见彼辈之见义勇为，同党相共患难，志坚金石，心窃慕焉。”^②因此，他所作的武侠小说，多以卖弄江湖秘诀、切口，钩沉豪侠轶事，铺叙会党规矩为特色，吆五喝六，煞有介事。故有人称他的创作是“帮会”小说，作者自己则也以“党会小说”为荣。类似的小说，猎奇多于本事，并不时流露出针砭现实、讽喻现实的倾向，正如徐文瀛所说：“这其实不是侠义，而是江湖秘闻了。”^③

除上述诸人，当时活动于南国的武侠小说作家，尚有江荫香、江蝶庐、李蝶庄、范烟桥、张恨水、庄病骸、何一峰、汪景星、拙笔山人、席灵风、陆士铎、李玉奇、黄南丁等，但多或蜻蜓点水、浅尝辄止，或信马由缰、敷衍成篇。权衡起来，难免等而下之。即如江荫香氏的《乾坤义侠传》，写明成化年间扬州名门之后杨练，访师姑苏，一边行侠仗义，一边又缱绻女色、终至“八美”同归、功成名就的故事。此中杨氏，虽不能说是一个淫邪小人，但起码也是好色之徒，追逐香艳的丑态倒把那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凛然正气冲得一干二净。小说的主旨，既落英雄美人的俗套，又兼失之于门第、功名等正统观念的窠臼，即便是较之几百年前出现的才子佳人小说《好逑传》，也还相形见绌、不可同日而语，何况时至今日？可笑的是，小说中男主人公的见异思迁、心猿意马，在虚情假意之中又使之丧失了一般的封建名教思想，加入了许多现代商品社会的享乐观念，至使小说也显得不伦不类，流气十足。这样的小说，我们实在不敢恭维。

张恨水所写的武侠小说，算起来只有两部，即《剑胆琴心》与《中原豪侠传》。

① 《碧血丹心大侠传·自序》

② 《江湖豪侠传·自序》

③ 《民国以来的章回小说》

前者通过一个寻师学艺的青年柴竞，巧遇风尘大侠朱怀亮及他们济人之难、奔走江湖的故事，寄托了作者仰慕侠风古道、同情草野黎民的思想情操。张氏善写云来雾去，飘然东西的隐形侠士，不单朱怀亮甘于寂寞、潜心酒家，伺机而动，叫人捉摸不定。就是那《啼笑姻缘》里的关寿峰、关秀姑父女，虎卧龙潜、销声匿迹，忽尔出手如电，叱若奔雷，又是何等的令人神往！

鲁迅先生在《有无相通》那篇“随感录”里，以戏谑的口吻说到：“南方人也可怜北方人太简单了，便送上许多文章：什么‘……梦’‘……魂’‘……痕’‘……影’‘……泪’，”^①等等，大概是不满于南方才子们的无病呻吟、近乎东施。那其中，自然也包括这些武侠小说吧？尽管向恺然深谙国术、熟悉拳脚，姚民哀也曾深入虎穴，颇获真知，但毕竟大抵闭门造车，很少真刀真枪地操持历练。况乎长年在吴侬软语、脂香粉黛的熏陶之中，大多数人难免柔肠多于侠骨呢！

于是，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北方人可怜南方人太文弱，便教给他们许多拳脚：什么‘八卦拳’‘太极拳’，什么‘洪家’‘侠家’，”^②等等。北方人开始于南方人的舞枪弄剑不以为然，自己按捺不住也要动手动脚了。首先应声而起的是玉田赵焕亭。此人“出笔很快，写稿字迹纤小……却很清楚，绝少钩乙涂抹，”^③故南北各报刊杂志均每每向其索稿，后因许多报纸告吹而不得不中辍的长篇小说竟达十余种之多。他的小说多据前人笔记而衍，“事非无稽，言皆有物”，且能“于劝惩之旨，尤三致意焉。至其间奇节伟行，艳闻轶事，以至椎埋之猾迹，邪教之鸱张，里巷奸人之恣恶变幻，无不如燃犀烛怪，禹鼎象物，读者神游其间，亦可以论古昔，察世变矣。”^④尤其难能的是，作者反躬自省，得以避短就长，不事瞬息万变打斗招式的渲染，而是精于人物心理活动的描述和人物性格的多方刻划，辅之赵氏的娴熟笔致，致使其作不乏格外动人之处。徐文滢说他“书中的特色，不是描写武术和虎虎有生气的斗争场面，而是社会人情的风趣和对白的流利。”^⑤也正是从这一点上发现了赵氏小说的长处。

赵焕亭著武侠小说，计有《奇侠精忠传》、《英雄走国记》、《北方奇人传》、《惊人奇侠传》、《边荒大侠》等多种，其中尤以前者所出最早、成就最佳、影响最大。此书写一“平乱”英雄杨遇春的成长史，对朝廷鹰犬极尽吹捧，而对苗莠饥民却极尽

① 《鲁迅全集·热风》。

② 《鲁迅全集·热风》。

③ 郑逸梅：《民国旧派小说名家小史·赵焕亭》。

④ 赵焕亭：《奇侠精忠传·自序》。

⑤ 《民国以来的章回小说》

蔑视、鄙薄，其封建正统观念是不加掩饰的。加之文中多杂狎，每有不堪，相对限制了其本身的价值和在今天重见天日的可能性。此书一九二三年开始付印，至一九二七年出齐。其影响虽不如《江湖奇侠传》般石破天惊的巨大，但也使赵氏声名远播，一时竟有与向恺然并世称雄的势头，被好事者呼为“南向北赵”。

北方人中另一位不甘寂寞的小说作者是托号“还珠楼主”的李寿民。当时，他很想将所历的山水人物写成笔记，恰巧天津的《天风报》无武侠小说可以连载，于是就有人鼓励他权做滥竽，因此，他漫不经心地以《蜀山剑侠传》为名，锋芒小试，不想却一发不可收。那是抗战爆发前几年的事。读者引领，书商垂青，遂使他撰兴大发，一集一集地写将下去，直至一九四九年三月中辍，已得五十五集，三百五十万字了，但却距他那写足千万字的计划，相距甚远。书中多写峨嵋剑仙云游斗法，惩治妖魔诸事，无统一人物，无核心事件，无非一些山鬼狐妖、鸟魔鱼怪的荒诞不经、离奇至极之故事，虽云小说，类乎神话。这是闲极无聊无以排遣的人们寻求刺激的麻木心理的直接产物，除其中想象丰富奇诡、语言摇曳多姿、色彩光怪陆离之外，别无长处，不足为训。然而以它为代表的那些不负责任的胡诌乱扯，却给不相干的武侠小说招至了凌言厉色的围攻，岂不冤枉！

还珠楼主才思敏捷，著作甚丰。武侠小说除《蜀山剑侠传》外，尚有《青城十九侠》、《云海争奇记》、《柳湖侠隐》、《北海屠龙记》、《天山飞侠》、《万里狐侠》、《武当异人传》、《边塞英雄谱》等。

就在还珠楼主蜗居天津，躲进小楼编排他那虚妄故事的时候，一位为避战乱流落青岛的北京人，却开始抱病咏叹那血泪交融的人生三昧。他就是王度庐。

王度庐由写北地红粉转而写燕赵英豪，大抵是在抗战爆发之后。他的《鹤惊昆仑》、《宝剑金钗》、《剑气珠光》、《卧虎藏龙》，故事藕断丝连，人物相互传承，构成了一个结构相当宏大的艺术世界。他将人间痛入心脾的爱情悲歌置于风云变幻的社会背景与诡异难测的人性前提之下，一次次地揭示了社会环境与名教纲常对人性与爱情的残酷摧折与异化。因此，他那掩映在刀光剑影中的男女恋情与人生追索，实际上就是他对现实社会的深刻批判与控诉。生活的严峻有时竟也震慑他不得不以大团圆的结局来弥补他自己心中的创痛——如在《风雨双龙剑》中的处理，然而，更多的时候，他也还不能不直面惨淡的人生与血迹斑斑的现实。《鹤惊昆仑》里鲍阿鸾的惨死，《卧虎藏龙》中玉娇龙的不幸命运，尤其是《冷剑凄芳》中小芳与卢宝娥玉石俱焚给憨厚正直的青年刘得飞的重创，实在叫人不忍卒读、怆然落泪。

王度庐式也弄人！

与王度庐几乎同时堕入武侠小说渊藪的是在天津《庸报》扬名立万的宫白羽，那时，北国已经沦陷。宫氏幼时曾述志“讲学著书”，后果有志竟成，却不料做教书先

生是那般清寒酸苦，令他哭笑不得。得暇著书，却为衣食所困，不得不违志卖文，投时谐俗。他本生性孤僻，生活的坎坷又令他常常悒郁。一次他被疑为窃贼，颇受猜忌，使他敏感脆弱的心受到创伤，从此处世为人的态度竟至大变，嘻笑怒骂，游戏人间，居然易与交往，得诸亲善。为人认真遭殃，草率得便；著书严肃则生计无托，随意调笑却丰衣足食。这种反常现象，曾令白羽无可奈何。他说：“劫后文坛落寞，坐令复瓿之物层出不穷，《钱鏢》四部销数十万卷，固始料所不及也。”^①语气中不乏苦涩。与他素相友善的老朋友也曾言：“造化弄人，不教他作他愿作的文艺创作，反而逼迫他自挝其面，以传奇的武侠故事出名。这一点，使他引以为辱，又引以为痛。”^②可见所言不虚。本来鄙视武侠，但最终却以写武侠名，是历史的误会，还是作者的幸运呢？难说。

白羽著有《十二金钱鏢》、《武林争雄记》、《联鏢记》、《偷拳》、《扬鏢记》、《龙舌剑》、《秘谷侠隐》等，行文注意人物形象的塑造，常以曲折突变的情节和老道历练的人物语言设置主体，动态地凸现人物性格，对话机锋毕露，弦外有音，每令人拍案叫绝。尤其是对于辄遭排挤、郁愤有加之类人物的刻划，甚为逼真恰切，酣畅淋漓，也许这与作者本人的心境不无关系吧。武侠小说成了作者发泄滞抑不平之气的有效途径了。

诗言志。武侠小说就是白羽的诗。

大概在白羽出现的前后不久，北方还有两位武侠小说名家，一位叫郑证因，一位叫朱贞木，与宫氏一起，大写其超技击武侠小说，并由此一起获得了“超技击派三大名家”的称号了。

郑证因于一九三七年左右与宫白羽结识，那时，白羽正在一家报馆编副刊，郑氏则正在这副刊上连载武侠小说。郑氏在白羽“下水”写武侠小说之初，对其帮助甚大。郑氏自己所著武侠小说颇多，据统计达八十余种，可谓洋洋大观。其中包括《鹰爪王》、《七剑下辽东》、《雪山四侠传》、《塞外惊鸿》、《风尘怪客》、《尼山劫》、《巴山剑客》等。前者泛一百二十万字，叙写武林正邪纷争，其间偶涉官府，但主要是基于个人恩怨，重视打斗，但无危言耸听之笔，是老老实实的武侠小说。

郑证因曾与宫白羽有过一段笔墨缘，值得一提。宫白羽在创作《牧野雄风》时，因患病，故请郑氏代撰，直至宫氏痊愈方才罢手。在二者的交往中，类似互相勸勉、帮助的小事很多，郑氏窘迫之时，也曾白羽家寄居。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二者的友谊，乃患难之交，迥与同行相轻者不同。

① 《十二金钱鏢·自序》

② 叶冷《白羽及其书》